

清史编委会 编

清代人物传稿

·下 编·
第八卷

主编：郭汉民
徐 彻



清史编委会 编

清代人物传稿

· 下 编 · 第八卷

主编 郭汉民 徐 彻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沈阳

1231428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八卷）

Qingdai Renwu Zhuangao

郭汉民 徐 彻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95,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frac{5}{8}$ 插页：4

印数：1--752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 虹 责任校对：安丽君 吴广君
封面设计：赵多良 版式设计：赵耀今

ISBN 7-205-02292-4/K · 249

登记号：(辽)新登字1号 定价：8.20元

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国家资助。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

编委会成员

戴逸 林增平 苑书义
李文海 林言椒

目 录

慈禧太后.....	王道成 (1)
慈安太后.....	王道成 (20)
同 治.....	杨裕南 (24)
隆裕太后.....	王道成 (33)
端 华.....	赵之恒 (37)
花沙纳.....	邹范林 (42)
陆建瀛.....	何 瑜 (45)
罗泽南.....	梁小进 (49)
陆应谷.....	张守常 (54)
恒 福.....	张瑞萍 (59)
沈兆霖.....	谢俊美 (62)
李棠阶.....	谢俊美 (66)
吴可读.....	刘建一 (70)
毛昶熙.....	胡建华 (73)
李金镛.....	乔 钊 (77)
曹廷杰.....	宋云亭 (82)
汪凤藻.....	杨裕南 (87)
任道镕.....	谢俊美 (90)
崧 蕃.....	牛鸿宾 (93)

严修	熊宗仁 (97)
恩铭	佟洵 (103)
戴鸿慈	丁旭光 (105)
载涛	迟云飞 (109)
载洵	迟云飞 (114)
铁良	关威 (117)
良弼	吴兆清 (120)
徐世昌	饶怀民 (126)
李经羲	方裕谨 (132)
朱家宝	梁锦秀 酒烈芳 (136)
萨镇冰	皮明勇 (140)
程璧光	郑焱 (144)
唐绍仪	刘可 (148)
赵秉钧	刘强伦 (153)
韦昌辉	余明侠 (159)
范汝增	沈雨梧 (166)
黄乃裳	佟洵 余琮 (171)
李平书	何泽福 (175)
杨衢云	张磊 (182)
徐绍桢	梁锦秀 酒烈芳 (187)
吴稚晖	饶怀民 (191)
王和顺	程昭星 (197)
毕永年	沈其新 (201)
谢纘泰	张磊 (204)

雷铁崖	唐文权 (208)
程家桢	迟云飞 郭汉民 (212)
徐宗汉	徐永志 (218)
柏文蔚	杜春和 (221)
陈其美	胡国枢 (225)
王天纵	谢照明 (230)
田 桐	程昭星 (234)
秦毓璠	汤可可 (238)
吕志伊	谢本书 (243)
林述庆	刘强伦 (248)
王 汉	许家煌 (252)
汪精卫	黄美真 (255)
井勿幕	张应超 (263)
郑 珍	陈 奇 (268)
莫友芝	王毅军 (273)
邵懿辰	余明侠 (276)
何 启	王光明 (279)
附：胡礼垣	
魏 瀚	林庆元 (283)
周 汉	刘泱泱 (287)
辜鸿铭	冀满红 (292)
叶德辉	易孟醇 (298)
刘师培	李妙根 (303)
陈三立	王继平 (308)
许鼎霖	王继平 (311)

苗沛霖	徐松荣 (315)
马德新	蒋中礼 (321)
韩宪宗 韩登举	乔 钊 (325)
武 训	余明侠 (333)
卫三畏	谢必震 (337)
伯 驾	谢必震 (341)
罗孝全	郑丽莉 (345)
文 翰	刘蜀永 (349)
额尔金	刘蜀永 (352)
何 伯	黄国盛 谢必震 (356)
威妥玛	杨遵道 (360)
葛 罗	刘蜀永 (364)
麦 莲	黄国盛 (367)
华若翰	黄国盛 (371)
阿列克谢耶夫	薛衍天 (375)
日意格	王 民 (381)
德克碑	郑剑顺 (386)
克林德	王 民 (391)
伊藤博文	赵 军 (395)
后 记	(400)

慈禧太后

王道成

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父惠徵，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元年（1851年），诏选秀女。二年，那拉氏被选入宫，封兰贵人。四年，晋封懿嫔。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皇长子载淳，晋封懿妃。七年正月，晋封懿贵妃。从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由于得到咸丰皇帝的宠幸，“时时披览各省章奏”^①，开始干预朝廷政事。

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进逼北京。八月七日，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大战于八里桥，清军失利。次日黎明，咸丰帝挈带着皇后、妃嫔、子女和一些贵族官僚匆匆从圆明园出发，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留下他的异母弟恭亲王奕訢与英、法侵略军进行谈判。

当咸丰即将出发的时候，懿贵妃极力谏阻，和咸丰帝发生了分歧。到达避暑山庄之后，肃顺乘机劝说咸丰帝像汉武帝将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赐死那样杀掉懿贵妃。咸丰帝“濡需不忍”，没有按他的意见办^②。但是，懿贵妃已“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了^③。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六岁的载淳即皇帝位，年号祺祥。尊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不久，又分别加上徽号，称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俗称

东太后、西太后。

咸丰帝临死的时候,一方面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8人赞襄一切政务,另一方面,又赐给皇后和载淳各一颗图章作为权力的象征。发布谕旨,均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曰:“御赏”二字,下曰“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慈禧则以皇帝生母的身分代行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这种体制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④。

但是,载垣等人为了独揽大权,不仅排斥远在北京的奕訢,亦不愿两位皇太后干预朝政。慈禧非常不满。她首先说服慈安,然后派人和奕訢取得联系。奕訢不顾载垣等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请求叩谒梓宫。八月初一日,奕訢到达热河,哭祭后,慈禧传旨召见,载垣等竭力阻挠。但是,慈禧坚决要见,多次派太监传旨。奕訢请端华作陪。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着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于是,奕訢单独进见,和慈禧、慈安秘密策划从载垣等手中夺权^⑤。奕訢认为,热河是载垣等的势力范围,要除掉他们,非回北京不可。慈禧担心外国人出面干涉,奕訢满有把握地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⑥这次密谈,长达两个多小时。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奕訢离开热河,连夜赶回北京。

八月初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慈禧看后,非常高兴。十一日,召载垣面谕照所请传旨。载垣等却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痛加驳斥。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送交慈禧,慈禧将它和董元醇的原折一起留下,不予发抄^⑦。慈禧召见载垣等人,载垣等怒形于色,

说他们是“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⑧。慈禧气得两手颤抖，小皇帝吓得直哭，把慈禧的衣服也尿湿了。慈安从中调停，劝双方“留着明日再说”。第二天清晨，慈禧没有传旨召见，载垣等以“搁车”相威胁，发下的折件，他们拒绝开视，说：“不定是谁来看。”到了中午，慈禧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拟谕旨发下照抄。载垣等要求钤用图章，慈禧也照办了。载垣等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⑨载垣等以为，慈禧已经向他们屈服，不再把慈禧放在心上，而慈禧则利用对方的麻痹，积极进行政变的准备。九月十八日，慈禧就在热河行宫让她的妹夫、咸丰的异母弟醇郡王奕譞草拟谕旨，准备回北京后发布。

根据奕訢在热河时一同商定的日程，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的梓宫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慈禧、慈安和载淳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恭送梓宫上车后，就从小路先行，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顺则和奕譞等随梓宫后发。赞襄政务王大臣中的三位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被巧妙地分割开了。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到达石槽，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九月二十九日，慈禧一行进德胜门回宫。九月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4人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纪纲而防流弊。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慈禧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早在热河就已经拟好的上谕，以不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回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令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接着，慈禧又以载垣、端华“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⑩。不久，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赐令自尽，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被革职。改年号为同

治,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载淳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奕訢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慈禧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之后,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湘军和淮军,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在统治集团内部,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海军、陆军,开办一些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加强清王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随着慈禧地位的巩固,慈禧和奕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四日,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尽管所劾各款,均不能指出实据,慈禧却以同治的名义,在一篇别字连篇的上谕中指责奕訢“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谄始(暗施)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①。于三月初七日发布上谕,革去他的一切差使。但是,这种作法,遭到了许多亲王和大臣们的反对。惇亲王奕訢于三月初八日上书慈禧,说“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请求“飭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②。当天,慈禧召见孚郡王奕讷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三人,令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

道明日于内阁会议，将惇王、蔡寿祺的奏折发下，并对他们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但是，在会议之前，慈禧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万青藜、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却又讲了另一番话，她说：“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即如载龄人才，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文祥、倭仁分别在会议上作了传达，诸臣相顾愕然，无所适从，不成议而散，定三月十四日再议^⑤。

三月十三日，醇郡王奕譞自东陵赶回北京，急上一疏为恭王求情，他说“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请求慈禧宽其既往，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慈禧将这一奏折发交王大臣会议。

三月十四日，王大臣等再次在内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赞成奕譞意见的人越来越多，最先认为醇王等疏可置勿议的倭仁，不得不四次修改自己的疏稿，肃亲王隆勤写成另一疏稿许多人表示赞同，后来，军机大臣列名于倭仁折，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70余人则在肃王折上署名。都察院、宗人府别有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给事中谭鍾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均有折上呈。慈禧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而且会引起外国的干涉，既然惩戒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顺水推舟，于十六日发布上谕：恭亲王奕訢

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四月十四日，慈禧又以奕訢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理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议政王名目则不再恢复，奕訢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同治亲政，两宫皇太后撤帘归政。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同治皇帝染病，御医诊断为天花，不能批阅章奏。在慈禧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又由她批览裁定。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刻，同治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戌刻，慈禧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奕谿、奕訢、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和等20余位王公大臣。慈禧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她选的这个人，就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她的外甥，年仅4岁的载湫。这个决定，使与会诸臣都感到吃惊。奕譞“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⑧。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慈禧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譔等以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湫。初六日凌晨，数百名侍卫和太监，手提灯笼，簇拥着4岁的载湫，蟒袍补褂入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以继承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慈禧和慈安又一次垂帘听政。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九日，45岁的慈安突然死去，她的死因，引起人们怀疑，有人认为，慈安是被慈禧毒死的^⑨。光绪九年十一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接连受挫。慈禧以奕訢“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职务，撤去恩加双俸，

家居养疾。宝璫、李鸿藻、景廉、翁同和等四位军机大臣全部罢免，令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庆郡王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结束了北京政变以来“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的局面^⑤。世铎、奕劻，才具平庸，惟慈禧之命是听，慈禧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军大败法军于镇南关（今友谊关），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不顾中国军民的反对，决意乘胜求和，下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天津签订《中法和约》。

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慈禧面谕醇亲王奕譞及军机大臣世铎等，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光绪当即长跪恳辞，奕譞、世铎等也恳请从缓，都遭到慈禧的拒绝。不久，发布懿旨：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王大臣等又纷纷上书恳请训政，经过再三请求，慈禧才表示同意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由慈禧作主，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指立为光绪的皇后，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同时入选，封瑾嫔、珍嫔。光绪十五年正月，大婚礼成。二月初三日，慈禧撤帘归政，御史屠仁守奏请明降懿旨，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披览，然后施行。慈禧斥为“乖谬”，将屠仁守开去御史，交部议处。但是，慈禧的急于归政，并不是她自愿放弃权力，她的一再推辞，甚至处分屠仁守，只不过是企图使人们相信“垂帘听政，本非意所乐为”，她的垂帘听政、训政，都是“一时权宜”，出于“万不得已”而已。

先是，光绪十一年九月，成立海军衙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他们秉承慈禧的意旨，以办海军名义，修葺清漪园。为了掩人耳目，恢

复昆明湖水操，并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这一工程公开，取“颐养冲和”的意思，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六十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地进行庆祝。十八年(1892年)十二月，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总办万寿庆典。十九年(1893年)春，又成立庆典处，专办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辟路所经，分设六十段点景，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特造彩绸十万匹，以供庆典之需。

光绪二十年五月，中日战争爆发，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一力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⑩在旅顺、大连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

十月二十四日，旅顺失守。美使田贝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为中日调处。先令停战，若议不成，再开战。光绪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无以计误我耶？”^⑪不愿接受。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珍妃之兄礼部侍郎志锐，“上书画战守策，累万言”。并与文廷式等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大臣。为了打击主战派，十月二十九日，慈禧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借口，将晋封不久的瑾

妃、珍妃降为贵人。一天之后，又说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交内务府杖斃。接着，将奉光绪之命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召回北京，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并裁撤满汉书房以孤立光绪。但是，主战的呼声并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二日，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杀李鸿章并弹劾军机大臣，认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托之传闻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尽管他表示，对于这样的传闻，他“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把矛头直接指向慈禧。慈禧大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十三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决定派遣李鸿章。正月十八日，慈禧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劻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⑨明日，发布上谕，李鸿章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锐意变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二十四年春，光绪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转告慈禧，慈禧非常生气，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再三劝说，慈禧才表示同意，“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⑩。四月十日，恭亲王奕訢病死。四月二十三日，慈禧面告光绪：“前